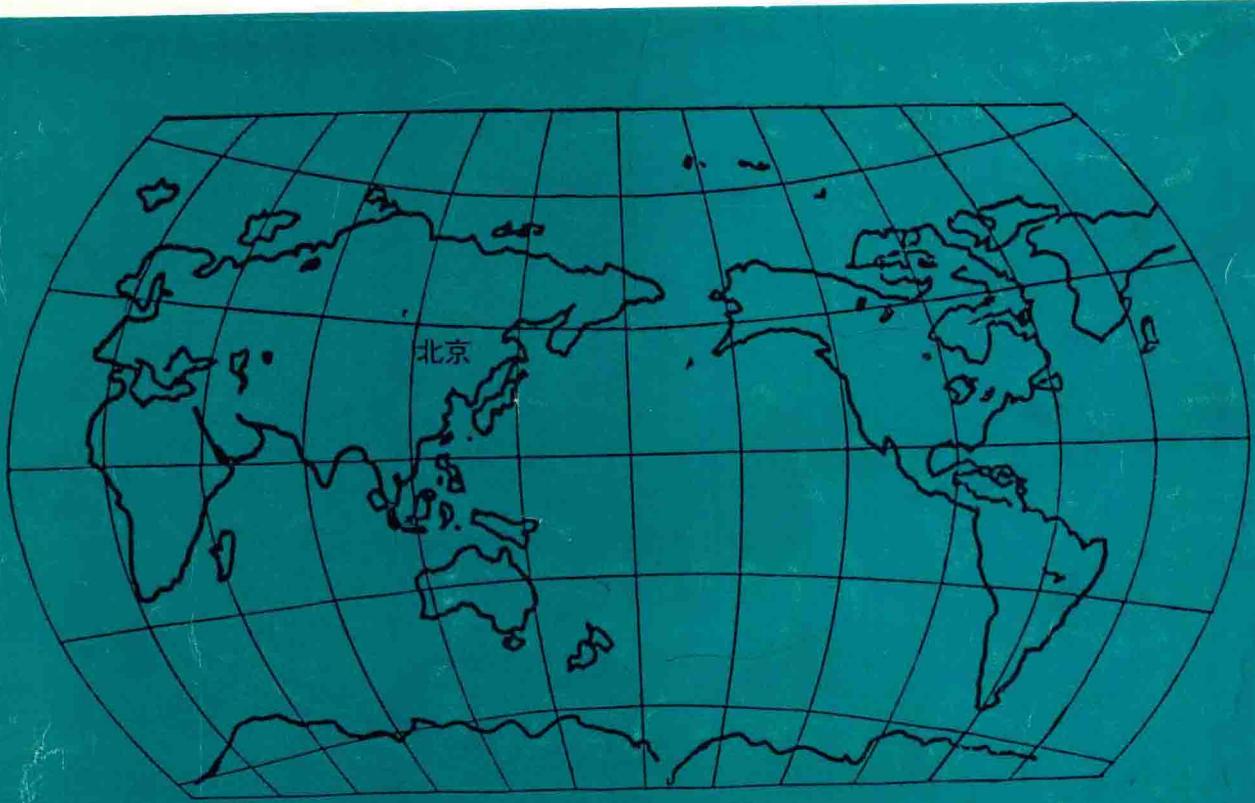


中外语言文化 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hinese-Foreign Languages & Cultures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第二集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 编

主 编 任学良

副主编 (以姓氏拼音为序)

蔡勇飞 冯颖钦 柳英绿

王之光 谢 屏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7.6.

责任编辑：崔健
封面设计：郑健民 再衡
责任校对：蔡勇飞 冯颖钦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第二集
任学良等 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延边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 27.25
字数：796 千字 印数：1—5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4-1038-4/H·187
定价：31.40 元

前　　言

任学良

第一部分 对各栏目的简介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第二集就要正式出版了，我谈点个人的感受，向同仁请教。

首先，这一集经过许多作者和论文编委会、延边大学出版社等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得以问世，实在来之不易，我深表祝贺；同时，感谢同志们对学会工作给予的积极支持！和第一集相比，这一集内容更加丰富。分十个栏目：一、庆祝香港回归专稿；二、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研究；三、文字语音比较研究；四、词语比较研究；五、语法比较研究；六、修辞比较研究；七、翻译问题研究；八、教学问题研究；九、其他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十、关于编撰《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的文件辑录。全集包括论文、文件、讲话等共102篇，79万多字，真可谓洋洋大观。

每个栏目都有出色的作品：为庆祝香港回归，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本会副会长王德春教授特别撰写专文，为香港回归后的语言问题贡献良策，可供特区政府参考；也表达了香港回归半月之际学会特在厦门举行全国学术研讨会的庆祝之情，庆祝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所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丝绸之路与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是一篇扬国威的力作，加上本文的编者按，共同表现出本会在理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我会的年轻会员迪丽达·吐斯甫汗女士言人所未能言：“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丝绸之路就把这人类的文明从东方的中国传播到西方；“绸丝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是世界经济之源，文明之泉，更是艺术之海，语言文化之洋”；“中华各族儿女为人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些论断，把中华语言文化在世界发展史上的作用，阐述得非常明白，远远超过以往研究丝绸之路偏重考证路线图的成果。

为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编委会的同志特别拿出力量找更多的根据，为文章作“注解”，所以写了长篇编者按。《编者按》既作了“注解”，又彻底解决了“支那”(China)的来源和含义这一悬而未决的难题，为国争光。我希望，我们的学会要以此为契机，加强理论研究，不断以新的成果向祖国汇报。

《“茶”的汉外音义小考》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说法，对学术研究很有裨益。

文字语音比较研究也发表了一些有新意的文章，可供参考。

词语比较研究栏佳作多：《日汉双语词汇异同比较》是很有科学价值的著作。它采取并列对照的形式比较异同，特别鲜明，一目了然。比较的结果。相同的不必说，差异处也是形异实同。值得研究之处是，差异从何而来？可以归纳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别、汉日语序的差别、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等等，这些差别都无损于实际内容的表达，所以“异”也是“相同”或“相通”。

《从相异点谈汉日惯用语》专门从差异出发比较汉日惯用语，对我们很有启发，建议好好读一读。

《汉语中的“汉外合成词”初探》对外来词的研究提出了新见解，比旧的说法更具科学性，因为它反映了这种构词法的本质特征。

《语言文化的比较和双语词典的编纂》自觉地把比较语言学引进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若能认真贯彻实行，必然能够编出高质量的双语词典，造福文化教育事业。特别可贵的是：文中引用了意大利人利玛窦神父及其他传教士明万历十年（1582年）来中国传教后的表现。他们用儒家的“仁”解释基督教的“爱”，成功地使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文化，产生了亲近感并表示认同，这是因为“仁”可以包容“爱”，孟子就说过“仁者爱人”（离娄）。他们还将“宙斯”（拉丁文 Deus[英文 Zeus]的音译）译为汉语的“天主”，于是

希腊神话中这位诸神和人类的主宰“宙斯”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落了户。

我非常钦佩、惊异这些传教士的创造才能！当对还没有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而他们却如此精于异中见同，未曾胶柱鼓瑟，又作何解释呢？我想，他们并非生而知之，不过善于虚心探求汉外语言文化异同而已。这样，若要说外国的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按照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利玛窦们应当是用的“对比语言学”）创始人的话，不应当是大家知道的 18、19、20 世纪那些人，倒应当是利玛窦等，因为他们主张将基督教教义和孔孟之道融合。中国呢？恐怕以三国时薛综为较早。《三国志·吴志·薛综传》：“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这就是公元 230 年左右中国比较语言学的粗纲。

《汉英人称名词后缀的语义比较》是一篇很精彩的著作，它把汉语人称名词后缀表现出的等级意义区别得十分清楚，使英语同类的后缀都为之逊色。

《汉俄形态构词及其比较》填平了一般认为汉语俄语形态学不可比较的鸿沟，这是本文的突出贡献。

《义素分析及语义同义场与双语词典释义的标准性》的作者，思路清晰，若能继续进行词汇的研究工作，必能大有成就。

《英汉成语活用现象剖析》，剖来剖去是同多于异，对大家也会有所启发。

语法栏不乏有真知灼见之作，《〈英语理解语法〉序》、《论语法比较的功能基础》、《朝鲜语直接宾语与其相对应的汉语宾语》是三篇各具特色的代表作，颇具可读性。它们证明语法并不是干巴巴的东西，看谁会不会深入研究，写出雅俗共赏、引人入胜的作品。歧义结构的研究也很有意思，指明了语法关系的排列、表达是很有讲究的，自然而然批评了语法无用论。

修辞研究已趋向深入开发固有的修辞格，这是好现象；但要避免某些神秘观念，影响正常的研究工作。我国是富于修辞传统的大国，《尚书·汤誓》就用了借喻“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太阳为什么还不死？我和你一起去死！）“日”借喻夏桀。这是公元前 1766 年发生的事情，距今 3700 多年，那时的中国人就会用借喻咒骂残暴的夏桀王，可见修辞并不神秘，不可被流俗之见所左右。

翻译问题也是本会关注的重要课题，因为翻译离不开比较语言学，本期发表的多篇文章就充分表示了我们重视的程度。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还要涉及翻译问题，这里不多说。

外语教学和本会有天然的联系，所以我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投入了不少的力量探索外语教学法的改革试点，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期特刊载学会给国家教委办公厅并转李岚清副总理的报告，向领导机关申请我会参与改革。这个报告集中反映了我会对外语教学法的见解，一旦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我们将组织力量逐步开展工作，已发表的各篇教学论文，也会在整个教学改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所长。

“其他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这个栏目，偏重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诸篇可谓各有千秋。

“关于编撰《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的文件辑录”，包括七个方面的文件、讲话、大型丛书工程的计划等内容。集中在一起反映出一个鲜明的事实：我们学会自觉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新学科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这就是编撰多语种的《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先集中力量出好汉英类、汉朝类，然后出其他语种。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进。《丛书》把我国的语言文化推出去，又把外国语言文化的有益成分吸收进来，这符合党的十五大精神。

本集的编辑工作存在一些缺点：有的文章打印的宽窄长短不同，校对不精，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克服，只好请大家谅解。

第二部分 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

在编辑过程中遇到许多学术上的问题，值得探讨。把遇到的问题摆出来，求得学会同仁共同的认识，我们学会蕴藏着的无限的潜在力量将会喷发出来，把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不断推向前进，从一个高峰到无数的高峰。为什么？因为学会有一大批可贵的中青年，他们很勤奋，搜集了不少的素材，但由于受到

各种不正确理论的束缚(这些理论来自他们的老师和社会上流传的论调),因而无法放开手脚驾驭那些材料,写不出理应写出的好文章;他们一旦获得解放,这无穷的力量产生的效果是可以想见的。

以下谈几个理论问题,供参考。

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否相同?

有人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外国人不一样,对吗?不对。

逻辑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类思考问题都遵守“概念、判断、推理”三个步骤,这就是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或思维方法。说详细一点是:“根据事实材料,遵循逻辑规律、规则来形成概念,作出判断和进行推理的方法,包括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演绎、归纳等。”(夏征农主编《辞海》119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难道中外人士不都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吗?如果中国人运用概念、判断、推理,外国人运用“推理、判断、概念”或别的什么方式,请问中国人和外国人能互相沟通思想吗?中文和外文能够互相翻译吗?勉强译出来可以互相理解吗?鸟类、猫、狗、老虎经过驯养都可以听懂人的话,和人的思维相通,何况中国、外国富于创造性的人?

有人以中医、西医为例,说明他们思维方式不同。这对不对呢?不对。这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思维方式没有区别。西医主要从局部看问题,中医主要从全局看问题,这是二者的区别。正因为这样,那些比较简单的疾病西医、中医都可以治好,有些复杂的病,如癌症,中西医得出的结论有时就不一样。有些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癌症病人,结果中医不开刀也治好了,这就和局部、全局的视角有关。

人类思维的工具是语言,但语言和思维、思维方式不能划等号。人类的语言有几千种,思维方式只有一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各种语言有不同的规则,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但每种语言所用的形式不可能相同,因此不能把语言形式的差别和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以致误入歧途,搞不好语言研究工作。

二、语言不同文化是否一定不同?

这不一定。拙文《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反映相同的文化现象》(见本刊19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不重复。文化相同,语言是否必然相同呢?也不一定。比如,全世界各民族语言一般都分为民族共同语和方言,那么,方言和共同语之间的差异,是共同的民族文化造成的吗?显然不是。方言多半是地理环境不同形成的,如中国的吴语、闽语、粤语和普通话的区别,就是地域不同的缘故。当然和人口迁移到某些地区也有关系。平原地区人民发音比较清楚,山区人民发音比较重浊,不够清晰,都和地理环境有关,和文化无关。

古英语的肯特方言(Kentish)、西撒克逊方言(West Saxon)、墨尔西亚方言(Mercian)、诺森伯利亚方言(Northumbrian)都是印欧语系西日耳曼那一支,由于各部族在不列颠岛上不同地区定居下来,原来的一些差别更加发展,因而形成四种方言,他们的民族文化却是相同的。

又如,古汉语的语法是同一种文化之下的语法构造,但却有差异出现,请看下例:

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宾动,左传闵公二年)

孔达曰:……我则为政,而亢大国之讨,将以谁任?(介宾,左传宣公十三年)

主君将令谁往?(动宾,战国策·东周策)

有的语序是“宾动”(和日语相同),有的是“动宾”,这是古汉语内部的问题,和文化无关。至于内部什么问题不在这里谈,以免涉及过宽。语言反映文化有一定的条件,它还要按照自己的内部规律发展,不受文化的约束,不然它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资格。

由此可见,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切忌随意贴标签,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

三、中外语言文化的异同问题

(一)先说语言异同。如果从语言形式上说,只有异而无同,无论从文字或语言上看都是如此。汉语和英语文字不同,语音也有差别,词汇、语法表面上也无共同之处。可是,问题还有另一面,从语言、文字表达的思想内容来看,却不能说“只有异而无同”。我读初中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大家编了一个顺口溜:

来是 come,
去是 go。
开门叫做 open door,
你的 father 就是我。

这是小孩子初学英语帮助理解、记忆汉英单词、词组异同的口诀，很有意思又诙谐调皮。它说明一个真理：十几岁的娃娃都能作简单的汉英比较，透过语言形式的差异看内容的相同，在母语、外语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学起来会较为容易，比单纯死记硬背效果好得多。

（二）中外文化的异同又如何呢？

我以为，也是有同有异，而且比语言更好理解。比如，古先民都信奉图腾(totem)，这是同；各民族信奉的图腾形象有区别，这是异。但是，抽象概括出来都是对自然物的崇拜，反映原始人的宗教信仰，这又是同。文学、艺术、典章制度、科学技术等等，共同性更多。

（三）语言文化比较研究找异找同的问题

1. 先谈找异

有两种性质的异：

①彻底的异，即从形式到内容都全然不同的“异”。如：英语的 th[θ]，汉语语音没有；过去中国行跪拜礼，外国没有；埃及有金字塔，其他国家没有；中国有万里长城，外国没有；……

②不彻底的异，即外表相异，内容相同或相通的“异”。本刊发表了孙振萍同志的文章（见 97 页），她专门从异的方面比较汉日惯用语，对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启发，建议好好读一读。

别的我不谈，只谈两个例子：

- 汉语说“面子大”，日语说“肩身宽”，语言形式毫无共同之处，但意思是一样的。
- 汉语说“坐冷板凳”，日语说：“椅子都坐热了”。表面上意思相反，可实际上意思相同，都表示“受冷落，不受重用”。

孙振萍同志的结论：“异曲同工”。

这里就引发出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观点、方法问题：比较语言学既找异又找同，不先入为主，找出结果再下结论；对比语言学虽然也说找同，但实际上重在找异。这种理论究竟怎么样呢？我的回答是：

害人不浅！不但坑害了一大批中青年，连我这老头子几个月来也被它弄得苦不堪言。

我作为本刊的主编，看了几个月的文章，既感到许多中青年勤于搜集，材料丰富，如引用了许多很好的英语成语，又可惜他们深受找差异不敢言同的桎梏，因而得不出汉译的结论，只会直译英语，如“力壮如马”，“教奶奶吃鸡蛋”，不能译成汉语的成语。……

请广大会员同志和读者回答这些问题吧。

2. 再说找同

我在约二十年前写《汉英比较语法》时，动笔前“总觉得汉英语法主要是异，不是同；写完以后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主要是同，而不是异。”（见《后记》）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点，但并不忽视异，大家看我的全书可以明白。

1973 年北京语言学院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老师提出下列问题：

“五位客人来了三位”，说明那两位不来了。

“五位客人来了三位了”说明那两位还要来。同样：

“我住北京住了两年”，说明现在不在北京住。

“我住北京住了两年了”，说明还在北京住，而且要继续住下去。

你们说：“了”表示完成，为什么用一个“了”，是完成了，用两个“了”反而没有完成呢？

这一问不要紧，把我们的汉语专家，包括号称“精通”汉英两种语言的权威都考住了，答不出来。

我是六年之后 1979 年才听人说这件事。当时我在哈尔滨，开始草拟拙著《汉英比较语法》。我说：这

就是汉语的完成进行体，和英语同样的句法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所以写进了我的著作。

我曾经批评过“现代汉语的科学研究存在两种缺点：食洋不化，抱残守缺。”（见《汉英比较语法》（增订本）《前言》，2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我国的对比语言学也存在食洋不化的毛病，上述留学生的问题答不上来就充分反映了这一事实。外国人说“对比”，我们也跟着说“对比”，对比主要找异，我们照搬，不敢找同；英语有完成进行体，汉语没有完成进行体的说法，再加表面上汉英完全不同，所以就不会分析汉语的问题。试问，对比语言学找差异的高手、权威为什么在这种“差异”面前束手无策呢？只见异不见同有什么用呢？

上述北京情况，和本会中青年同志不会翻译那些英语成语为汉语成语，岂不是如出一辙吗？

现在回到“找同”上面来。汉外语言一般都是从异中见同，日语是这样，英语、俄语……也是这样，所以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同形式表达相同的内容），我讲的英语表量词、虚拟语气等等都是例子，请大家参考上述增订本《前言》。同时，要拿出学术勇气，敢于根据调查分析，得出合乎逻辑但与现成结论不同的结论。没有这种勇气，要想学业有成，难。

此外，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好好学习、研究汉语，不要只会言必称外国，对汉语理解却很差。同时，要学点逻辑学，把自己的思想理出清晰的条理。

四、两种语言之间绝不可能有等值的翻译，对吗？

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从对比语言学重在找差异演绎出来的，既然差异为主，当然不可能有等值的翻译。可是，这纯粹是主观臆断的结论，经不起翻译实践的检验。难道我国翻译的许多佛经、圣经、马恩列斯著作、各国的文学名著，通通是不等值的翻译吗？

有一个极端的例子：“I am a student”译成“我是学生”也不是等值的翻译，因为“a”没有译出来。“a”是否可以译出呢？可以，表特指就可译成“我是个学生”，不强调特指就不必译出。

可以说各人的翻译水平有高低，大家都应当向高水平看齐，达到“信、达、雅”。切不可用“不可能有等值的翻译”吓唬人，使中青年望而生畏，这不好。

我们认为：翻译家应当是比较语言学家。比较语言学让人异中见同，避免翻译失误；翻译过程就是舍异求同的过程。只要善于钻研，完全可以达到信达雅，其前提条件是，能熟练运用汉外语言文化。请参看本文第一部分（2页）利玛窦等人的翻译。

五、外语学习和母语的关系

澳大利亚坦佩高中语言学校有一个口号：“要学好英语，先学好母语”（见《汉英比较语法》增订本660页），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有些青年同志的汉语文章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疙里疙瘩，实在不敢恭维。无论英译汉、汉译英都成问题。如“哪里，哪里”在这里并不是“什么地方”的意思，而是表示否定，照本义应译为 no, no. 而不是 where, where. 至于中国古诗英译的笑话更多。

总之，中国人学外语，不以汉语作基础，路子会越走越窄，反之就越走越宽。一条金光大道摆在我们的眼前，就看走不走。

要说的话还有，就此搁笔。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第二集 目 录

前 言

一、庆祝香港回归专稿

- 01 论香港的双语现象 王德春(01)

二、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研究

- 02 丝绸之路与中外语言文化交流 (哈)迪丽达·吐斯甫汗(07)
03 “茶”的汉外音义小考 蔡勇飞(14)
04 浅析中英茶业发展的特色 黄学红(17)

三、文字语音比较研究

- 05 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反映相同的文化现象 任学良(19)
06 从听力测试分析中国大学生外语听力理解方面的障碍 楼荷英(21)
07 剖析会话含意 提高听话理解能力 李果红(25)
08 汉语语音文化特征在俄语学习中的反映 姜雅明(27)
09 英语单词辅音字母双写初探 李 隽 杨新安(30)
10 英语语音学教学实践初探 谢 萍(33)

四、词语比较研究

- 11 日汉双语词汇异同比较 余焕睿 三喜田光次(38)
12 汉语中的“汉外合成词”初探 蔡勇飞(52)
13 语言文化的比较和双语词典的编纂 许威汉 徐时仪(57)
14 词典与文化刍议 李 明(61)
15 义素分析及语义同义场与双语词典释义的标准性 李红梅(65)
16 论各种词义的民族性 董 明(68)
17 汉英法律词汇的比较初探 谢丽琴(71)
18 汉英人称名词后缀的语义比较 杨信川(74)
19 汉俄语形态构词及其比较 杨 杰(78)
20 英汉成语活用现象剖析 冯珍娟 邵伟国(86)
21 汉英成语与中西文化 梅桂能(90)
22 试论英汉成语文化色彩的异同 王 蕾(95)
23 从相异点谈汉日惯用语 孙振萍(97)

五、语法比较研究

- 24 《英语理解语法》序(节录) 胡壮麟(103)
25 论语法比较的功能基础 王之光(104)
26 朝鲜语的直接宾语及与其相对应的汉语宾语 柳英绿(110)
27 日汉副词对应关系的研究 顾盘明(115)

28	汉英主位——述位比较	张思锐(120)
29	生成语法的统制概念与英、法、汉代词的照应特性	李燕玉(125)
30	英语、母语和法语	吴永琴(135)
31	浅议英汉语法歧义	闻亚云(139)
32	英语中的反身代词与汉语中的“自己”之比较	卢桂冬(143)
33	汉英多项定语的关系及其顺序探索	应真箭(147)
34	汉英语序差异比较	章晓雯(151)
35	试析汉英语序的相异性	沈 红(154)
36	英语中的歧义结构	王善芝(158)
37	英汉表示否定的语言文化现象之比较	姚茉莉(163)
38	汉英称谓的特殊功能	温象羽(166)

六、修辞比较研究

39	“PERSONIFICATION”与“拟人”:语义功能比较研究	李国南(170)
40	汉英借代比较	高 伦(176)
41	隐喻的语言	丁菲菲(182)
42	对英汉比喻美学价值的思考	黄慧敏(189)
43	汉英喻词语用功能的对比	方丽青(192)
44	英汉修辞比较六题	童 一(194)
45	英汉委婉语比较	周荣鑫 李元江(197)
46	从文化内涵谈英汉委婉的表达	黄晓龙(200)

七、翻译问题研究

47	“原汁原味说”质疑	潘文国(202)
48	汉语紧缩句及其英语翻译	高 游(209)
49	浅谈从 CET 新题型英译汉	许华琳(212)
50	汉英文化差异与汉英口译	贾爱兵(214)
51	试谈中英语言文化差异对习语翻译的影响	邢亦平 傅超波(217)
52	比喻翻译历时研究	金 明(220)
53	英汉典故的差异与翻译	方 瑛 徐亚萍(224)
54	浅谈汉语习语的翻译	李力群(226)
55	从文化意象的传达看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创造性的表达	刘建刚(229)
56	融合与分类	孙 喆(234)
57	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及其翻译	张 琦(236)
58	英汉对译中词义现象的比较	何其红(242)
59	中文动物商标词英译的文化差异	黄玉玺 林雪玲(245)

八、教学问题研究

	学会给国家教委并转李岚清副总理的报告	(249)
60	我是怎样学习外语的	杨镇雄(251)
61	发明识字电脑 丰富中外教坛	蔡勇飞 蔡 阖(254)
62	澳门的语言教学与东西文化交流	杨秀玲(265)
63	扩大与记忆英语词汇的新窍门	关靖华 华成吉(273)

64	汉英词汇记忆方式差异与低年级大学生的英语词汇教学.....	王健倩(285)
65	“综合”外语教学法试论.....	叶建平(288)
66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及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何少庆(292)
67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色彩文化.....	潘杰(295)
68	培养外语语感是克服语用迁移的方法之一.....	张琦(298)
69	英法语言比较教学的应用.....	胡佳(301)
70	英语交际法及其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王敏(309)
71	英语教学中的英汉互译及比较	李凤荣 曹军(312)
72	英语词汇教学刍议.....	李隽(316)
73	语言文化差异与英语教学.....	陈素燕(319)

九、其他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74	诗酒风流 中西近之.....	冯颖钦(322)
75	同是一种痛苦的追求.....	谢屏(329)
76	同是闺中情,却是别样境	徐焰(333)
77	生死茫茫,魂系亡妻	罗伊莎(340)
78	玛伍德与秦香莲.....	邵灵侠(345)
79	两个悲剧女性的心态.....	丁芸(348)
80	中英诗人与四季漫谈.....	郁仲莉(351)
81	沉郁顿挫之理在中英诗词中的体现.....	章汝雯(354)
82	英汉小说开头功能分析.....	陈晓静(358)
83	词语的文化联想含义对理解文学作品的影响.....	陈明瑶(365)
84	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期文体变革的内外动因	成梅 李兵兵(369)
85	里奇的“礼貌原则”与中国的《易经》	徐兴仁 杨镇雄(373)
86	西方姓名的构成及其文化底蕴	肖辉 王艮(376)
87	了解个体主义,促进文化交流	赵斌涛(379)
88	谈英汉语言中的“个人语型”现象	徐亚萍 戴丹青(382)
89	交际中各种因素造成的心距离及其言语选择	贾福生 张梦井(386)
90	称赞语与文化差异.....	鲍泓(390)
91	红色在中西文化中的联想对比	林明金 陈晓春(392)
92	社会文化对汉英语言的影响.....	陈屏(396)
93	Grice合作原则普遍性再探	陈立美(399)
94	从“人”一词说起.....	杨舒(406)

十、关于编撰《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的文件辑录

95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的通知.....	(409)
96	展示新成就 祝贺十五大	(409)
97	迎接21世纪学会规划(草案)	(410)
98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编撰工作会议开幕词.....	任学良(411)
99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总序.....	戈宝权(414)
100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编撰计划	(415)
101	编撰《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丛书》若干问题和体例的建议	(421)

论香港的双语现象

王德春

编者按：本会1997年7月中旬在厦门举行全国学术研讨会，隆重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我会副会长王德春教授在全体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本文就是他发言的主要部分，借以庆祝香港在受到英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同时对香港的语言问题深表关切，提出诸多建议。现特刊载于此，仅供香港特区政府和广大同胞参考。

香港，这个美丽繁荣的海港城市，世界经济、金融中心之一，在离开祖国一个半世纪后，已于1997年7月1日回到祖国怀抱，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无不欢欣鼓舞，普天同庆。

香港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鸦片战争后，根据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政府于1842年（清道光22年）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接着又于1860年（清咸丰10年）把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一带割让给英国，后来又于1898年（清光绪24年）把深圳以南的整个九龙半岛租借给英国。英国对上述各地区进行了一个世纪到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我国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香港回归祖国前后的日子里，海内外谈香港、议香港，十分热闹。谈论的焦点之一是香港的语言问题。没有香港同胞与大陆同胞之间畅通的言语交际，没有与世界各地华人共同相互理解的语言，香港特别行政区就难以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最近十年，我多次去香港讲学、学术访问，与香港语言学界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深感语言问题对香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不管从语言学理论角度，还是从语言学应用角度，或是从语言实践角度都值得研究和讨论。

经过长期殖民统治，殖民者的语言（英语）已成为香港的正式官方语言。进入本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民间团体要求中文成为法定语文的运动迅猛开展，因为单一的英语不仅伤害香港居民的民族感情，也给生活带来不便。我到香港教育学院演讲时，遇到该校中文教师、香港作家潘铭燊先生，他送我一本散文集《转向》。根据他的回忆，在他小时候，香港街头有很多“大众秘书”性的摊子，代人看英文公告信，填表格，填报税单等等。每当香港政府部门发下英文公告信件，香港居民，包括潘先生的父亲就要放下工作，去找“大众秘书”帮忙翻译。他父亲常发牢骚：“香港地，中文无用”。潘先生在这种牢骚声中被迫转读英文中学。当时他想，“官民沟通，为什么不用民间普遍懂得的语文呢？发出一万封信，便起码有七八千收信人要到处求人代看！”潘先生认为这是殖民政府不合理的语文政策造成的。由于他的反叛性格，进大学时转了一百八十度弯，挑了中文系。他说：“你轻视它，我偏要读！”正是由于像潘先生这样广大爱国居民的反抗，迫使香港政府于1970年成立了“中文研究委员会”，1972年又成立了“中文公事管理局”，1974年通过条例，承认中文具有法定地位，其中第三条确认，中、英文同为官方语文，并宣布中、英文享有同等地位。这是香港居民反对殖民者语言同化政策的胜利，使祖国语文在殖民统治下取得与殖民者语言同等的合法地位，成为官方的正式语言。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殖民统治就是殖民统治。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理事会主席姚德怀先生谈到过，香港长期以来就重英文轻中文，七十年代以后中文虽然也成为法定语文，但重英轻中的现象没有改变。文本有歧义时规定仍以英文本为准。我自己身历

其境，深有同感。我在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和双语学系讲学三个月期间，校方给我的一切信件、通知都是英文本。在中文和双语学系尚且如此，何论其它！重英文轻中文的原因，除港英当局的权势之外，还因为英文在商业、金融等领域广泛流行，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掌握英文的居民有就业、工作等方面的便利。

这是英文与中文相比，重英轻中的情况。现在再来看看这具有法定地位的中文具体指的是什么。根据1987年香港首席按察司委派的“如何在法庭上可以比较广泛使用中文”专责小组所采纳的原则：“所谓中文，就是香港人惯用的中文，写的是繁体字，说的是广东话。”同年5月，香港署理教育及人力统筹司表示，将来香港的学校会推行母语教学，所指的母语是广东话。从这两段话看来，他们所说的中文，指的是用繁体字书写的、有香港行文特点的书面语和口头说的广东话。香港属我国粤方言地区，居民日常交际使用广东话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普通话没有普及，居民不会讲，甚至听不懂。由于殖民统治时间长，我国五十年代开始的推广普通话政策，无法在香港地区实行。不仅如此，我国台湾地区的推行国语办法，以及新加坡的推广华语运动，对香港地区也影响甚微。可以说，在几个主要使用汉语的地区，香港的民族共同语的普及率最低。

与此相应，香港学校的教学语言主要是英语，少量用汉语教学，用的也是广东话，极少用普通话。这当然也与殖民统治有关。1902年发表的所谓《宝云报告书》说得极其露骨：“使华人接受英语教育后对大英帝国产生好感，并使英语更广泛地传播，那末帝国在中国本土所得到的利益会远远超出这个殖民经费了。”可见英国殖民者不惜重金在香港推行英语教育的恶毒用心。直到1935年，《宾乃尼报告书》才建议：“香港教育应改变为着重学生的母语训练，使其母语能力在思想及表达方面都能应付裕如，然后才对于学生在职业上对英文需要提供训练。”不言而喻，这儿的“母语”指的是广东话，这种语文教育导致学生在生活上使用广东话，在职业上使用英语。这种格局延续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小学曾开设“国音”课；英文学中学会考时也可选考国语作为半科。但是由于考生逐年减少，于1965年停办。1974年香港政府承认中文具有法定地位后，中学会考时，英文学和中文学开始合用同一试卷，并将中文科分立为必修的中国语文科和选修的中国文学科。这里要特别提到，在以英语和广东话为教学语言的总格局下，少数学校坚持用普通话教学。1953年创办的苏浙小学，在办学之初就毅然决定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这在当时的香港教育界不啻是勇敢的革命行动。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及其确认的1997年香港回归，像平地一声春雷，震动了香港语言学界和语文教学界，也震动了香港各界人民，促使他们认真考虑语言问题。两个现实问题是：第一、香港人要与大陆各地人民以及世界各地华人进行言语交际，必须尽快掌握汉民族共同语，因而急需在全社会推广普通话；第二、公文事务处理要符合现代汉语公文事务语体的要求和共同语的规范，中文文件不应再是英文的翻译或夹杂广东话的香港行文，因而要对全体公务员和公司职员进行处理公文的训练。为解决这两个实际问题，香港从八十年代中叶起，形成一股中文热潮，延续十多年有增无减。诸如语言政策、语言教学、语言使用、言语修养、语言研究等都引起大家的普遍关心和重视。

1990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这一条文可理解为：首先，中文是香港各机关的正式语文；其次，英文也是正式语文，各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也就是说，97回归后，香港仍然采用中文、英文两种正式语文，不过原来以英文为主，回归后以中文为主。香港语文学界都是这么理解的。1987年3月，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理事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语文使用的一些设想和建议》第一条也明确肯定：“中英联合

声明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机关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根据这一条文，我们认为：将来特区政府所用语文，应该以中文为主，英文为辅。”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建议特区政府“积极推广普通话”，“并对未来的语言文字使用作出规划。”当时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理事会主席缪锦安先生、现任主席姚德怀先生和香港中文教育学会会长施仲谋先生在其言论中以及与我个别交谈中，均这样理解。

97后的香港社会接下来的问题是，“中文”指现在通行的广东话，还是共同语？照常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正式语文应该是民族共同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理应以普通话为正式语文，并大力推广，改变以广东话为正式语文的现状。当然，广东话作为方言，仍然是香港居民的日常交际语言，并继续在言语交际中起重要的辅助作用。所以，香港特区基本法中所说的中文，应指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这一点在我与香港语文学界的交谈中也有共识。

从原来以英文为主，重英轻中，中文就是广东话的旧格局过渡到这一新格局，有许多工作要做。下面是香港语文学界和各界人士正在做的几项主要工作：

一、推广、学习普通话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是我国各地人民和海外华人（即中华民族）共同使用、相互交际的语言。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在交际功能上，使用范围上获得很大发展，结构体系也更为丰富，在功能和体系上都区别于各地方言而处于主导地位。汉民族共同语是在汉语发展过程中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吸收其他方言的成分，主要在官方的正式使用中逐渐形成的。我国历代，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大都建都北方方言地区，因此北方话逐渐成为各地人民的共同交际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官话”。五四运动前夕开展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加强了官话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并使以北京话为代表的，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共同语取得“国语”的地位，成为迅速普及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空前统一，普通话广泛通行。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规定了民族共同语的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实行汉语规范化，逐渐使普通话普及全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语。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早在1946年就成立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当时由语言学家魏建功任主任委员，1959年起由台湾省教育厅长兼任主任委员。1973年公布国语推行办法，次年又订定台湾省各县市加强推行国语教育改进要点，规定公教人员说国语，并提高基层人员国语能力。台湾居民积极学习国语，成绩很大，现在50岁以下的人基本会讲国语。我作为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的语言学顾问，应该所长何景贤博士邀请赴台访问期间，所到之处，普通话通行无阻。

顺便说说华人人数占全国人口77%的新加坡。1979年9月起开展声势浩大的推广华语运动，要求居民“多说华语，少说方言”，当时的李光耀总理亲自主持了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典礼。自那以后，每年10月定为推广华语运动月。1991年10月，应新加坡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主任卢绍昌教授的邀请，我正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有机会作为贵宾参加了当年新加坡的推广华语运动大会。吴作栋总理到会讲话，强调推广华语的重要性。经过大力推广，华语在新加坡十分通行。我两次去访问时，讲学、交谈、购物、旅游，一切活动，普通话也基本上通行无阻。

比起大陆和台湾，甚至比新加坡，香港在这方面比较差，但受到1984年关于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震动的香港人民，立即行动，掀起一浪又一浪的学习普通话高潮。

香港的大众传播媒介也很重视普通话的推广，《大公报》等报纸辟有普通话专栏，时有关于汉语知识和语言教学经验的介绍。电视台改变了广东话一统天下的局面，普通话节目日益增加。每天半小时的普通话新闻，尤为引人注意。我就亲耳听到香港电台、电视台的

“贸易普通话”、“学听学讲普通话”、“南北乐逍遥”、“文学花园”等普通话节目。

香港工商界人士认为学会普通话可与大陆做生意,又可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所以学习积极性很高。现在很多商店面对越来越多的大陆顾客,不仅“欢迎使用人民币”,而且力争用普通话接待。分析普通话在香港顺利推广的原因,主要是由于97年回归祖国,有商业交往的实际需要,也有爱国精神的鼓舞。当然,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与全民说普通话目标的距离还很远;但形势喜人,前途十分乐观。姚德怀先生曾经乐观地估计,“到2010年,香港中学毕业生应该可以自由运用普通话。”

二、学习中文应用文

如前所述,在殖民统治语文政策的影响下,香港的中文应用文不仅有翻译痕迹,而且行文习惯和公文程式与大陆不尽相同。97后的香港特区政府与北京的中央政府及各省政府的公文往来,香港商界、学界与大陆企事业的文件往来要求香港公务员和有关人员具备处理规范应用文的能力。这促使香港各界像重视学习普通话一样,重视学习合乎规范的中文应用文。

我国大陆应用文都是白话文,公文程式简单,通俗易懂,对语法、词语,甚至标点符号都要求准确无误。我国台湾地区的公文虽然比较传统,但七十年代进行了公文改革,对老的公文程式有所突破,要求使用语体文,简显明确。至于新加坡,也于七十年代进行了应用文改革,1977年发表的《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简化应用文的格式和称呼,提倡直话直说,删除陈旧的客套用语,使应用文写作接近中国大陆的写法。唯独香港,由于长期以英文为主、为准,使中文应用文写作处于落后状况。行文半文半白,程式陈旧,既受古文的束缚,又受译文的影响,香港学者戏称它“不像方言,不像文言,不像外语,不像普通话”,姜子牙的坐骑“四不像”。提高公务员和有关人员的应用文写作和处理水平,迫在眉睫。公务员训练处、政府各部门、各公司企业把学写应用文与学说普通话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抓紧进行。我曾应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的要求,向他们提供了应用文写作的建议,对应用文的格式、写作要求、用语特点和行文特点做说明,特别提醒他们考虑香港公务人员与大陆各界的交往,以便通过应用文沟通两地的关系,以利于两地公务和商务往来。

这几年,香港公务员积极参加中文应用文写作课程班,1993和1994年约有1500人学习,1995年增至7800人,使公务员训练处措手不及,仓促应付。但是,该处高级训练主任越佩芝女士是带着欣喜的感情向我介绍的。据她的估计,1996年参加学习的将达到万人。除他们自己组织学习外,还派人到大陆院校深造,力求尽快提高中文写作水平。公务员训练处和有关政府部门推行了使用中文部门的试点计划,先后开出15门有关中文写作课程,从演说词到会议纪录,从建议书到报告书,无一不列入学习内容。除开班授课外,香港政府法定语文事务署还分三阶段印发《中文公文写作手册》,内容包括理论概述、词语使用、公函写作和其它文体应用文写作等。

应用文写作不仅是公文程式和写作格式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写作者的语言水平、文化修养和写作能力的问题。与学习普通话一样,香港公务员普遍撰写和处理中文应用文,也得分批分阶段进行,估计需要到2010年才能大见成效。

三、规范书面语

其它书面语,如报到书籍的语言,比起应用文来,问题要少一些。现在的中文报刊,基本上是用普通话写作,个别副刊文章有用广东话写作的,但比例极小,不影响全局。问题是整个报刊用语颇多不合规范之处,规范书面语也是香港语文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香港的书面文献中,科学论著、严肃的文学作品、语文教材的课文、报刊社论、正式场合的书面文件,语言规范较好。许多作家用规范的语言写作。

但在一般的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书面语中,如消遣性的报刊文章、私人信函、商品广告、通俗歌词、接近生活层面的新闻报导等,语言问题较多,词语问题尤为突出。其原因是:第一、口语和书面语脱节,写作时找不到恰当的普通话词语,就用方言词代替,如“足球队员单刀攻门,门将不能抵挡。”这儿的‘单刀’相当于‘单枪匹马’,“门将”指“守门员”,都是香港口头用语,很容易进入报纸的体育新闻稿。第二、受大陆、台湾、新加坡用语影响,词语选择困难而形成混乱。如上文出现的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命名,大陆叫“普通话”,台湾沿用“国语”,新加坡称为“华语”,香港地区几个名称长期混用,在使用中“普通话”频率越来越高。但在书面文献中经常有“普通话(国语、华语)”的用法。第三、外语借词的音译习惯不同。有一次,我在街头看到“修理梳化”的广告,不明其意。后来才知道,普通话长期使用的语音借词“沙发”,香港话说“梳化”。第四、香港词语中不仅有广东话的地方变体,由于一个多世纪与祖国分离,还出现一大批社会地域双重变体词语,如“打工皇帝、夹心阶层、通天巴士”等。

香港语文界人士有一致的看法:香港中文书面语的规范应以汉民族共同语为准,在规范化过程中,应注意吸收方言词语、口语词语、社会地域变体词语等各类变体的有益成分来丰富共同语词汇,使共同语获得不断发展。按照这一原则进行语言规范化,不仅会使香港语文健康发展,而且会使普通话不断丰富。

顺便说一下“写的是繁体字”问题。大陆简化汉字已取得成效,为广大群众普遍接受,简体字表也为新加坡采用,在新加坡也行之有效。我到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去演讲时,曾表示看到简体字书写的《联合早报》有一种亲切感。但香港和台湾仍沿用繁体字。我到台湾研讨此问题时,台湾学者曾提过“写简识繁”或“写繁识简”的过渡办法,即在他们采用简化字之前,双方先识对方使用的字体,以便于书面交际。这一点实际上香港也在做。我多次去港讲学,黑板上写的都是简体字,学员识别无误。这是因为简体字多半是由历代中国人行书楷化而成,识别、使用都省时省力,香港应当可以接受。八十年代初,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根据大陆的《简化字总表》,新加坡于1974年采用的《简体字总表》,以及台湾1979年公布的《标准行书范本》,提出796个共通的简化字,列成《共通简体字表》,并向香港政府考试局提出建议:1、正式公布准许考生用简体字答卷;2、制定并颁布《公开考试通用简体字表》。1982年4月,香港考试局复信称:该局“最后决定仍维持现行接受考试中所见常用简体字、减笔字、俗字等等通融办法,而不作宣布或颁布。”从回信看出,考试局实际已经接受常用简体字,只是不作宣布而已。这比起过去对考卷中的简体字扣分的措施来,不仅是一种通融,而且是一种进步。我想这也是我在香港自由使用简体字而无妨碍的原因吧。有了这个基础,97后的香港特区政府如果采用简化字方案,想不会有太大的阻力。“书同文”是海内外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从长远来看,香港采用简化字,对与大陆的联系更为有利。至于说“汉语拼音方案”,香港实际已经接受。我见到的几本普通话教材,都是用拼音方案来进行普通话语音教学的。不仅香港,由于联合国采用拼音方案注音,连台湾的对外汉语教学也不得不改用拼音方案来代替注音字母了。

四、改革语言教学

香港的语言教学有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是用什么作为教学语言,二是开设哪些语文课程,怎样开设。

关于第一个问题,前面已提到过,香港学校的教学语言主要是英语,少量用汉语教学的,用的也是广东话,极少用普通话。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英语逐渐成为社会上的优势语言,不管是政治经济因素,还是实用因素,都要求香港人学好英语。英语教育也成为权势的象征。这是殖民主义对香港实行语言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企图使香港的中国人忘掉祖国的语言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英国的顺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以后,大量推行日

语教育，也是同样的目的。

香港的生活语言是广东话，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上说广东话，到学校勉强用英语听课，教学效果很差。语言学不好，知识也学不好。因此，香港教育署于八十年代末发表《检讨提高语文能力措施工作小组报告书》，提出三七分流建议，即三成中学一年级学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七成以汉语为教学语言，但分流的进展缓慢。目前，全港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中学仅占中学总数的15%，这15%中，绝大部分采用广东话为教学语言，用普通话教学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大学教育也是如此。这凤毛麟角的代表就是前面提到的苏浙小学。该校王健英老师曾在香港普通话研习社听过我的演讲，并作了个别交谈。据我所知，苏浙小学从1953年建校起，一直坚持用普通话教学，学校里订立“在校必讲普通话”的校规。办出了特色，报名入学者十分踊跃。例如，侨居菲律宾的一些华侨，普遍希望他们在香港的子女会说普通话，因而送进苏浙小学。几十年来，该校学生参加教育署举办的各种甄别考试，平均成绩全列入甲等。这说明以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教学质量更有保证。香港大学施仲谋先生谈及，他的一项调查证实，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的大陆和台湾学生，语文应用能力明显高于使用方言教学的港澳学生。所以，香港特区政府，如果能在教学语言上做到英汉三七分流之后，再在汉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中，做一次广东话和普通话的三七分流，就可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

关于第二个问题，语文课的设置问题，进展比较快，普通话课程的设置尤为明显。原来香港学校的语文课，读写的是普通话，听说的却是广东话，即用广东话来教学汉语书面语。在语文课的教学语言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只好另设普通话课来培养学生普通话的听说能力。1981年9月，香港教育署执行普通话教学试验计划，分两期在42所小学和51所中学进行。1986年9月正式推出普通话课程，列为小学四至六年级的选修科目，周学时1—2节。1988年9月扩展至初中。截至1990年9月，开普通话课的小学共有815所，占总数的48%。还有266所通过课外活动教普通话。各大学也普遍开设普通话选修课，受到学生欢迎。香港大学每年录取普通话初级班选修科学生四百余人，但报名者往往超过三、四倍。我在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和双语学系用普通话为学生上课，已无语言障碍。由于香港的特殊情况，普通话科与中国语文科是两门课程。中国语文科用广东话上课，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即广东话的听说能力和普通话的读写能力。1992年开始，香港中学六年级又增设“中国语文和文化科”，目的是加强学生讲和写的技巧，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门课程听说部分仍用广东话。香港教育署课程发展处将于1998年全面推行普通话新教程，这套课程用于全香港小学一至六年级，中学一至五年级，并将发展为中学合考科目之一。全新普通话教程重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并强调通过学习普通话更了解中国文化。教育署颁布的课程纲要指出：“普通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在国际上是代表中国的语言。”总的说来，学校里普通话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还没有达到社上那种学普通话的热潮。

今后发展的可能是：在推行普通话新教程之前，已开设普通话选修课的中小学逐步改为必修课，并增加周学时；中国语文课逐步改用普通话上课，然后大中小学从文科到理科逐步扩大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的比例。要做到普遍以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还需要相当时间的努力，香港语文教学界任重道远。《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36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包括……教学语言”。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会制定有效的语言政策。

总而言之，据我的亲身观察和体会。虽然香港语文的问题很多，困难不少，但呈现繁荣向上的局面。香港回归祖国后，学好中华民族共同语，也有助于更好地学习英语和其他外国语。我们相信，今后香港仍然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语言世界，而且以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语言状况迎接大陆同胞，迎接全世界华人和外国朋友。